

“十四五”时期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战略应对

庄芹芹¹

(中国社会科学院 北京 100732)

【摘要】：“十四五”时期是上海实现2020年基本建成国际金融中心目标后，建设一流国际金融中心与支撑人民币国际化以及提升我国大国金融地位的战略机遇期。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结合上海金融中心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十四五”时期，上海要将建设国际金融中心与落实好国家重大战略任务紧密结合，扩大开放创新，打造基于人民币资产的一流国际金融中心，提升全球资源配置功能，构建优良金融生态系统，提升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服务好国家发展改革大局。

【关键词】：上海国际金融中心 “十四五”时期 人民币国际化 金融科技

【中图分类号】：F127.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1309(2020)09-0051-005

当前，国际经济格局、金融治理体系、金融中心竞争以及金融科技等领域正在发生深刻变化。而即将到来的“十四五”时期，是我国“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也是上海在2020年基本建成国际金融中心目标基础上，迈向更高水平建设开局的起步期。有鉴于此，本文在对“十四五”时期国际金融环境变化趋势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结合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所面临的制约因素，提出“十四五”时期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战略应对。

一、“十四五”时期国际金融环境变化趋势

“十四五”时期，全球经济增长、国际金融治理以及金融科技发展等方面呈现出新形势新特点，尤其是面对新冠疫情在全球范围内的持续影响，国际金融环境将发生深刻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国际金融治理体系加速变革

一是经济增速下行风险显著，全球经济复苏不确定性强。随着全球人口增速放缓、人口老龄化加速，以及资源环境约束偏紧，全球经济增长动能呈减弱迹象，下行风险显著上升。^[1]据IMF预测，2011—2025年全球平均增速为3.58%，处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相对低位。尤其是当前面对新冠疫情对主要经济体的深刻冲击，经济复苏回暖趋缓，多家海外机构认为需要到2021年底经济才可能回到2019年底疫情爆发前的水平。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经贸摩擦的后续效应在“十四五”期间将持续发酵，这对产业结构、需求结构等产生深层次影响，给我国经济运行带来偏弱和不稳定的外部因素。

二是经济多极化趋势更加明显，金融治理体系加速变革。新兴国家仍是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占比将持续提高。部分亚非国家将领跑全球经济增长，印度、越南等新兴国家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劳动力优势和地缘优势明显。全球经济重心将从欧美转移到亚洲，据世贸组织研究测算，全球2/3以上的中产阶层将集中在亚洲地区。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

¹作者简介：庄芹芹，经济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基金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与上海市政府联合委托课题《上海“十四五”规划发展环境与思路研究》的阶段研究成果；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质量治理体系与政策研究”（编号18ZDA079）。

家和新兴经济体在国际金融事务中的话语权不断提升,金融治理体系迎来变革。

三是全球债务水平创历史新高,主权债务风险凸显。在全球融资加速收紧和汇率波动加大的背景下,全球主权债务风险将继续显现。受防疫封锁影响全球债务水平持续上升,国际金融协会(IIF)指出2020年第一季全球债务高达258万亿美元,相当于GDP的331%,创历史新高。政府成为第二大负债主体,债务总额仅次于非金融企业。潜在主权债务风险逐渐向发达国家转移,从“穷国重债”转为“富国重债”。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程度加深,主权债务风险的影响程度和范围不断提高。

(二)人民币国际化持续推进,国际金融中心竞争日益激烈

货币国际化与国际金融中心演进存在较强同步关系。从国际经验看,本币国际化进程将极大地促进本国金融中心地位和影响力的提升。一方面,“十四五”期间,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将不断提速,作为计价、支付、投资、储备的货币功能不断增强。人民币储备货币地位的认可程度与日俱增,目前已有新加坡、俄罗斯、澳大利亚等60多个国家将人民币纳入外汇储备。随着人民币自由兑换等国际化进程加快,将产生大规模资产交易需求,带来上海金融中心资源配置功能与国际地位显著提升。另一方面,国际金融中心呈现多元化发展趋势,竞争日益激烈。^[2]纽约和伦敦仍将是国际主要金融中心城市,以上海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金融中心城市,在全球金融体系中排名上升。根据2020年最新发布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FCI)排名,上海上升至第4位,较上期第5名上升了1位。依托于高速增长,印度孟买等也有可能成为有影响力的金融中心。此外,韩国、俄罗斯等国家也在谋划金融中心建设。

(三)金融与科技加速融合,成为新一轮全球金融增长和竞争的焦点

一是全球科技“一主多翼”加速融合转变。“十四五”时期信息技术将继续主导催化,推动全球科技“一主多翼”加速融合转变,5G技术、物联网、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加速进入成熟商用。数字经济将加速产业数字化变革,推动各个产业加速融合发展。颠覆性科学技术密集涌现,生物科技、清洁能源、新材料与先进制造技术、量子计算机与量子通信等将展现出丰富的应用前景,不断创造新产品、新需求、新业态。科学研究组织与模式创新加速变革,创新活动向个性化、开放化、网络化、集群化方向发展。

二是全球产业发展与分工格局将重塑。新技术革命将改变各国比较优势,变革现有分工格局。自动化和人工智能方面的优势将改变过去由人力成本优势决定的全球分工模式,逐渐由产业间分工向产业内分工再向生产环节和生产任务分工转变,步入全球价值链竞争时代。信息革命加快了新技术的扩散速度,参与创新门槛不断降低,传统产业的竞争将更加激烈。数字经济将加快知识的扩散溢出,并改变原有产业特性,改变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布局,推动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推动一些中等收入经济体崛起。加大核心技术攻关,抢占产业制高点成为引领发展的新趋势。^[3]

三是金融科技将成为未来全球金融的增长点和金融中心竞争的焦点。金融科技是由技术驱动的金融创新,依托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信息技术与金融业务深度融合,将重构金融服务生态格局。^[4]世界主要经济体纷纷制定金融科技发展政策,挖掘前沿金融科技蕴藏的增长红利。比如,英国在网络借贷支付、金融数据分析、区块链、开放银行、监管沙盒等领域已处于世界领先水平,金融科技投资规模领先纽约。新加坡知识产权局则发起了金融科技专利申请快速通道,大大缩短了专利审批时间,提高了金融科技创新效率。

二、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存在的不足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与人民币国际化具有战略一致性,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在岸金融市场,是人民币成为世界货币的有力支撑;本币国际化进程将极大促进上海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和影响力提升。近年来,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取得了显著成绩,金融市场体系日益完备,金融机构不断集聚,金融开放持续扩大、金融改革全面推进,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坚实支撑。2018年,上海金融市场交易总额达1654.8万亿元,是2008年的近10倍;直接融资总额达9.6万亿元,占全国直接融资总额的85%以上;在沪持

牌金融机构 1605 家,比 2008 年翻了近一番,外资金融机构占比近 1/3。结合我国经济实力和人民币国际地位,对标国际一流金融中心,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还存在以下几个方面不足。

(一) 金融市场配置全球高端资源能力不强,金融营商环境有待提升

一是人民币市场基础距离国际货币职能差距较大,金融产品创新步伐滞后。人民币可兑换程度与资本账户开放水平不高,汇率形成机制与利率市场化仍存在诸多不足,限制了资金跨境流动。以人民币定价的国际化交易品种较少,风险对冲工具短板尤其明显。这是由于现行监管体制机制制约,导致产品创新审批流程繁琐、周期过长,监管部门间难以有效协调,贴近市场创新的决策效率不高。二是金融市场大而不强,资源配置效率有待提高。“上海价格”风向标作用尚未充分发挥,离成为全球人民币产品交易主平台和定价中心仍有较大差距。尤其在金融衍生品与外汇期货等领域,缺乏全球定价权与话语权,对资金、信息、科技等要素配置能力有待提高,作为全球投融资中心作用发挥不够。三是金融营商环境有待优化。法律、税收与金融人才等软环境亟需优化,尤其金融法律法规国际化程度不高,较难适应金融开放创新需要。创新理念与先进城市存在差距,对全球高端人才吸引力不足。

(二) 金融科技存在“强金融、弱科技”制约

上海建设金融科技中心最大的优势是金融基础雄厚,但存在“强金融弱科技”的短板。一是创新策源与产业基础能力不强。上海科技资源集聚不足,金融科技原始创新能力不足。金融科技基础、产业规模和发展潜力与北京、深圳等地相比存在差距。二是产业集群缺乏领军企业驱动。上海金融科技公司多为银行系金融科技公司、网络理财与支付机构等传统金融机构。新型金融科技公司大多聚集于北京、深圳及杭州,如蚂蚁金服、腾讯 FiT 等,鲜有几家总部在上海,金融科技产业集群缺乏驱动核心。三是金融科技渗透度偏低。现有金融科技应用普遍较为简单,有待与金融业态深度融合,金融新技术发展和应用场景仍有待挖掘。

(三) 金融中心成长缺乏科技创新的实体经济土壤

一是上海高显示度的特色新兴产业尚未形成。相对于北京聚焦高精尖新经济、深圳聚焦电子信息支柱产业以及杭州聚焦数字经济,上海产业结构调整处于爬坡期,新动能的显示度不高、对金融发展支撑作用有限。二是核心技术“卡脖子”瓶颈突出,尤其是在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生物医药等领域。三是金融资源未有效转化为科技创新优势。对比深圳华为、比亚迪等,扎根上海本土的世界级制造业企业缺乏。在外资与国企双重挤压下,民营经济生存空间不足,缺乏吸引资金持续流入的实体经济土壤,金融发展呈现“脱实向虚”。资金链、创新链、产业链良性互动尚未形成,制约了国际金融中心的未来成长空间。

三、“十四五”时期上海建设国际一流金融中心的战略应对

“十四五”时期是上海实现 2020 年基本建成国际金融中心目标后,建设一流国际金融中心与支撑人民币国际化以及提升我国大国金融地位的战略机遇期。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结合上海金融中心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十四五”时期,上海要将建设国际金融中心与落实好国家重大战略任务紧密结合,扩大开放创新,打造基于人民币资产的一流国际金融中心,提升全球资源配置功能,构建优良金融生态系统,提升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服务好国家发展改革大局。

(一) 用好自贸试验区试验田,推动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与人民币国际化“双轮互促”

一是持续推进人民币市场体系建设。在上海自贸试验区新片区试点突破限制,加快推进人民币自由兑换与资本账户开放,积极扩大利率市场化空间与汇率自由浮动区间。建设全球人民币定价、交易、清算和业务中心,打造人民币资产定价的“上海价格”。二是赋予上海更大自主性,下放贴近市场的产品创新权利,提高金融市场决策效率。为强化人民币“高流动性”根基,必须完善人民币产品和风险对冲工具,构建符合国际通行规则的事中事后监管体系,拓展市场广度和深度,提升市场规模和影响力。一

方面,加大人民币产品创新,打造人民币跨境投融资中心。继续推动股债市场参与国际化指数,进一步放宽外资持股比例限制,提升人民币资产吸引力。与此同时,加快配套市场交易、服务、咨询等一系列措施建设,满足全球人民币资产投资者需求。另一方面,补齐衍生品短板,建设人民币金融资产风险管理中心。完善风险对冲工具,大力推进衍生工具创新和市场建设,探索推出以汇率、利率、股票、债券等为基础的各类金融衍生产品。三是对标一流国际金融中心。上海应及时制定出台《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十四五”行动计划》,对标纽约、伦敦,以最高标准建设一流国际金融中心。

(二)加强标准引领与机构培育,打造全球领先的金融科技生态圈

一是推动金融科技领先发展、标准引领,创新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加强前瞻布局,探索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电子商务等新技术在金融领域的应用路径与方法。加强前沿技术标准引领,研究制定金融科技“上海标准”,掌握行业发展主动权。加强金融科技领域的知识产权保护,借鉴新加坡经验,开展金融科技知识产权保护快速通道,提供快速专利申请和授予程序,提高金融科技创新效率。二是培育平台金融科技机构,“弯道超车”提升机构辐射能级。针对上海金融机构能力偏弱实际,借助金融科技机遇,引进和培育具有世界影响力的金融科技平台企业,吸引和聚集金融科技公司前来落户和投资,以“他山之石”赋能传统金融机构。^[5]设立各类研发平台推动企业定位延伸和转换,发挥知识互补与网络效应,提升金融机构辐射力、影响力和话语权。三是构建集共性技术研发、成果应用与价值扩散一体的金融科技生态圈。建立金融科技集聚区,吸引各类市场主体进入、成长壮大并对外赋能,形成各类金融科技创新业态相互交织、共同繁荣的市场环境。激励金融科技成果应用,建设金融技术服务中心和金融信息中心,实现价值扩散与对外渗透。

(三)明确科创板技术导向,推动科创中心与金融中心建设良性互动

一是明确科创板技术导向,精准服务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领域。面向世界科技前沿、经济主战场、国家重大需求,着力培育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生物医药等领域本土科技巨头。^[6]二是做好差异化制度设计,与存量市场错位竞争。对科创板发行、上市、交易、信息披露、退市等各个环节进行制度创新,健全以信息披露为中心的注册制,以竞争压力和示范效应推动存量改革。优化投资者结构,引导保险金、养老金、境外机构投资者等入市,提高长期机构投资者占比。三是优化金融营商环境,打造科创资源与金融资源有机融合的良好创新生态。打造一流金融运行规则、法律法规等营商环境和监管标准,不断完善金融法治、税收、会计、信用、监管等制度,建设制度创新和金融人才高地。注重风险防范,建设金融风险管理与压力测试中心,有效提高金融监管和风险防范能力,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继续扩大金融对外开放程度。继续扩大金融对外开放程度,放宽外资市场准入、缩减负面清单。

(四)探索示范区制度创新,突破长三角金融一体化壁垒

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是区域协作的突破口,要利用示范区的制度优势,逐步突破金融市场的行政边界壁垒,以金融一体化服务好长三角一体化国家战略。一是鼓励金融机构分支机构落户示范区,探索金融业务“无界”经营示范制度。尝试建立跨区域金融机构,加快资金跨区域自由流动和资金配置效率。加大外资银行引入力度,发挥其在跨区域经营方面的更有利条件,在长三角范围内设立分行和子行。二是完善信用信息共享平台,推动区域统一信贷市场形成。探索长三角区域信贷联动机制,推动信贷授权与授信一体化,建立分类、准入、核心客户认定等互认机制。增加区域内信贷供给,针对区域一体化的重点项目和领域,统一协调信贷投放政策,重点支持交通网络、产业链深度融合等项目,以及环境综合治理等领域。积极开发绿色金融产品与服务,助力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建设。三是建立长三角金融市场一体化办公室,推进协调制度落实与评估。加强城市、省级层面金融市场一体化协调推进,推动政策规划、要素、信息等方面的协调对接。放权区域内各城市金融发展,鼓励周边城市灵活运用政策充分对接中心城市。研究跨区域资金流动与金融风险监测指标,探索风险联防联控路径。

参考文献:

-
- [1]李伟, 隆国强, 张琦, 赵晋平, 王金照, 赵福军. 未来 15 年国际经济格局变化和中国战略选择[J]. 管理世界, 2018, 34(12): 1-12.
- [2]王力, 黄育华. 从国际金融话语权提升研判我国金融中心建设[J]. 银行家, 2018(12):106-110.
- [3]何建武, 朱博恩. 2035 年全球经济增长格局展望[J]. 中国发展观察, 2019(Z1):37-44.
- [4]金鹏辉. 加快推进上海金融科技中心建设[J]. 上海金融, 2020(1):2-4.
- [5]孙国峰, 邓婕, 栾稀. 后 2020 时期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远景目标[J]. 上海金融, 2019(3):1-9.
- [6]李国庆. “十四五”时期中国发展环境与上海重大发展思路[J]. 科学发展, 2020(6):5-15.